

古籍版本常識

中医研究院 图书馆
北京中医学院医古文教研组 翻印

中国版刻图书流流

(初稿)

北京市中国书店

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。我国的图书也有着极悠久的历史。中国书籍何时出现，现在尚难断定。相传上古时就有史官掌管著作。但初期书籍的材料不是纸，首先是甲骨，随后是龟甲、石头，然后是竹木。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记载，孔子晚年读《易经》，编简策的皮条曾断换了三次，可见古人读书确实不易。春秋以后，出现了帛书，就是写在丝织品上的书。《礼记》末年已有帛上写字的事迹，《墨子》书中也提到“书于竹帛”。用帛写书可以依照文章长短随时剪断，也可以卷成一束，随意所卷，以便阅读，这样就出现了“卷”。一卷大体上相当于简策的一篇或几篇。因此，“卷”就成为计称书籍数量和计称书中内容的单位。

到公元前二世纪，西汉的时候，已有纸张出现。公元二世纪初，东汉和帝时，蔡伦改进了造纸方法和造纸原料，可以用树皮、麻头和破布、鱼网造纸。纸的出现是人类文化史上一件极其重大的事情，这是我国人民的伟大发明之一。但是当时的书籍，主要还是依从人们的相传抄，不但费时长，效率低，而且容易发生错讹。到了东汉灵帝熹平四年，汉灵帝叫蔡邕把六经写好，刻在石头上，立于洛阳太学门前，作为定本，颁行天下，任人惠借，此为经书刻石最早者。石经一出，不仅便利了当时的读书人，而且也发了雕版印刷术的创造发明。

一、雕版印刷术的起源

印刷术的发明是对人类文化发展的一个重大贡献。印刷术

I256/ZYT

基本上有两种：雕版印刷术和活字印刷术。现代的书笈绝大多数是用活字印刷术印成的，但没有雕版印刷术作为先驱是不会发明活字印刷术的。这两种印刷术都是我国劳动人民的发明。

木版雕印是我国古代印刷的主要形式。雕版印书究始自何时，很难绝对肯定，从前有人认为是五代时冯道创始的，但我们已发现九世纪所印的书，并且发现了九世纪的印刷物和文献记载。这都在五代以前，所以这一说法已被事实所推翻。又有人认为是起沅于隋，到了唐朝逐渐流行。明朝陆深在他著的《河汾燕闲录》中说：“隋文帝开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，敕废冢、造经志令雕造”胡应麟在其《少室山房笔丛》中说：“印刷肇自隋时，行于唐世，行于五代，行于宋人。”陈少一人的说法，都是以隋费长房所著：《历代三宝记》上的记载为依据，但是《历代三宝记》的原文是“隋开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，敕废冢、造经志令雕撰。”意思是雕冢、撰经，陆深误将“撰”为“造”，就误认成雕造经版。清初三士禎在他的《居易录》内已经指出这个错误。

孙毓参在其《中国雕版沅流考》内根据罗振玉的《沙山石室秘录》说：“有宋太平兴国五年刻雕隋刻《大隋求陀罗尼》”。因之说雕印开始于隋，其实也是一个错误。这首《陀罗尼》是在敦煌发现的，法国的巴黎国民图书馆和卢浮宫的博物馆都有收藏，上面左有懿皇帝和顺一行，右有王文诏雕版一行。但其标题是“大随求陀罗尼”，而不是“大隋求陀罗尼”。“大随求”就是“大白石的总总”，是佛家的成语，并不是指隋朝。在“王文诏雕版”一行末后还有“太平兴国五年六月二十五日雕版毕”手记，并无“翻雕”字样。总之，雕版印刷术说是在隋朝就已经发明，还没有足以令人信服的证据。

根据近年发现的实物证明，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开始于唐代的说法是比较可信的。

唐代刻本，一九〇〇年在敦煌也有发现，最著名的一种是《金刚经》，题有“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”。咸通九年即公元八六八年。这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有明确日期的印刷物。这经长约一丈六尺，由七个印张粘接而成的卷子本。最前的是一幅扉画，是释迦牟尼佛在祇树给孤独园说法的图，其余是《金刚经》全文。雕刻非常精美，刀法遒劲，足以证明这是雕版技术已达高度熟练时的产物。此书墨色浓厚，匀称，清晰显明，说明印刷技术的高度发展。这一切说明，印刷术的发明，当远在公元八六八年之前。

此外，日本存有宝龟元年（公元七七〇年）的四神印本《陀罗尼经》。当时中日交通频繁，我国许多书笈流传到日本。印刷术并非日本发明，而是由我国传去的，所以在此时期以前，我国一定已有印刷术的存在。这也可以作为我国在八世纪已有印刷术的傍证。

现存文献中最光明确提到印刷的是《旧唐书》，该书《文宗本纪》有如下一条记载：太和九年（公元八三五年）十二月“敕诸道府，不得私置日历版”。根据《册府元龟》卷一百六十《帝王节制》第二，可知这是由于当时东川节度使冯宿的奏请而下令的。冯宿在其奏文中说：剑南、两川及淮南道的人民都用版印刷日历在市上售卖。每年中央司天台还没有奏请颁新历的时候，这些印成的日历已遍天下，可见当公元八三五年，唐文宗太和九年时，我国已有印刷的日历。这当然不是印刷术初发明的事。

在此十年前，公元八二四年，唐穆宗长庆四年，元稹给白居易《长庆集》作序说：“至于缮写模勒，鬻卖于市井，或持之

以交流著者，处处皆是”。“横勒”二字，一般都认为就是刊刻。如果不错，那就是现存文献中最早提到印刷的了。这样，在九世纪初期，现在的江苏浙江境内就已经有了印刷的文集。

此外，柳珪在他《冢训》的序里，也记载了他自己于公元八八三年，唐僖宗中和三年在成都书店中看见许多关于阴阳、杂记、占梦、相宅的书。这些书大多是雕版印纸，但已模糊得难以完全认识。可见，此时我国雕版印刷已相当普遍了。

根据上述所有实物和文献记载说明，认为我国雕版印刷发生于七、八世纪之间，而在九世纪后期就已相当发达，是比较妥当的。

二、唐朝的版刻

雕版印刷术发明以后，上百页、千页的书可以一次印成。书的生产易，比过去手写本时代是大大迈进了一步。我国雕版印书，在唐朝后期（九世纪）已经流行，刻书的范围也相当广泛，有：日历、佛经、文集、小学及阴阳占卜等类。

唐代佛教盛行，佛教徒很早就利用雕版印刷作为宣传佛教的工具。唐末司空图为洛阳敬爱寺僧惠确写的雕刻《律疏》，曾说印本共八百纸。由于唐太宗崇信佛教，所以官家也刻印佛经。据记载，唐太宗时，玄奘取经回长安，曾刻印佛经与晋贤书，用回锋纸印刷。道光年间在敦煌发现了唐咸亨元年王玠出资雕刻的卷子本《金刚经》，是现存最早的木刻印书，可惜已被英人所坦因盗走。近年又在四川唐墓中，发现成都孙家刻印的梵文《陀罗尼经》，这是国内现存的最古刻本。

雕版印刷术在唐代后期有了广泛的发展，广大的市民阶层也利用它作为传播文化的工具。民间需要的歌曲、日历、韵书就首先刻版流通。唐时，白香山的诗，最受人民群众的欢迎，

前石堤到元微之给白诗作序，曾说有人拿白诗印本在市场上出卖，或换取茗沈。王琬在他所著的《唐语林》内说到，唐僖宗中和元年（公元八八一年）以后江东地方印本，日历的晦、朔相互有出入，有人因此发生争执。这说明当时刻印日历的不止一家。从敦煌盗走的书笈中，就有太和二年（公元八二八年）和乾符四年（公元八七七年）所刻的两本日历。这是现存日历中最早的刻本。前石也曾提到，随着唐僖宗到成都的柳批，在他《家训》的序中曾记载：中和三年癸卯夏，奎輿在蜀之三年也。余为中书舍人。旬休。阅书于重城之东南。其书多阴阳、杂记、占梦、相宅、九宫、五纬之流。又有小学字书。率雕版印纸，浸染不可晓。”可见在唐僖宗中和三年时，成都不仅有印刷的日历书，而且也有印刷的其它书笈了。

唐咸通六年（公元八六五年），日本僧人宗叡，游学中国，回国时带走的杂书中有西川印子《唐韵》、《玉篇》各一册。所谓西川印子，就是四川印本的古称，这说明唐朝版刻已盛行于世，所刻印的书笈，不只在国内流通，而且已经向海外传播。但不幸的是唐代的刊本现在能够看到的已经很少了。

三、五代版刻的发展

到了唐朝末年，因为政治腐败，学校废弛，文化事业趋于停滞不前。迨至五代，统治阶级和佛教徒们都大力提倡刻印书笈。前蜀乾德五年（公元九二三年）孟咸和尚刻印了贯休的《禅月集》。后唐明宗时，宰相冯道见流行市间的版刻图书，多是市民阶层常用的日历和一些通俗读物佛经经文，而没有士大夫所需要的书笈。因而与齐愚、李昉、朱圜、吕监、田敏、校定《九经》，刻版印卖，以广流传。朝廷准其所请，于后唐长兴三年（公元九三三年），开始校刻，先刻《九经》，至后周广顺三

年（公元九五三年）六月书版刻成。因此各家记载，有谓雕版印书始自冯道之说。从此以后，政府刊印书笈的事业开始了。在《九经》刻成的同时，还刻了《五经文字》、《九经字样》二书。以后又刻了陆德明所著《经典释文》。由于这次刊刻是由国子监所主持，所以称为“监本《九经》”。

五代的时候，不但有了官刻的经典，并且在士大夫阶层内也有了出资刻书的人。蜀相，毋昭裔贫贱时，尝向友人借《文选》，人家不愿借给他，因而他说：我如日后显贵，一定把这些书刻印出来。后来果然当了后蜀孟知祥的宰相。逆践前言，出私财百万创立学馆，于后蜀二年（公元九三二年）令其门人勾中正、孙逢吉书写《九经》、《文选》、《初学记》、《白氏六帖》，雕版行世。那时的四川成都，在文化事业方面，有了很大的发展，成为我国西南地区的文化中心。

五代刻本，穷唐代刻本一样，流传到现在的已非常之少。所仅存的几种都是在敦煌发现的，而且都是残本。监本《九经》虽然很受当时读书人的重视，但一本也未保存下来。

四、宋代版刻事业的兴盛

中国的版刻事业，到了宋朝时候，已经极为昌盛。北宋国子监除了翻刻五代监本十二经外，又遍刻九经、唐人旧疏和宋人新疏，并刻了很多史书、子书、汇书、类书、文选。当时的浙东、浙西，经济繁荣，生产发达，又盛产纸张，尤其是杭州一带，版刻事业更为发达，雕版技术熟练的工人也都集中这里，所以杭州刻印的书也是多。

北宋刻书多据监本。自从冯道提倡民间自由雕刻《九经》，确实给图书开辟了一条普及的途径。冯道校勘《九经》时，汉、魏、六朝石经已历经兵燹残毁不全，完卷的只有在西夏的唐开

成间郑覃写刻的十二经，世称“《开成石经》”。《九经字样》就是根据唐石经校定的，也就是宋人所称的旧监本。

《五代会要》中《经笈门》说：“长兴三年二月，中书门下奏请依石经文字（唐《开成石经》）刻九经印版，敕令国子监集诸生生徒，将西京石经本各以所业本经，广为钞写，仔细看读，然后雇石能雕字匠人，各下随快刻印，广颁天下。如诸色人妄写经书，并须依所印敕本，不得更使杂本交错。其年四月，敕差太子宾客马缟，太常丞陈观，太常博士段颢、路航、尚书屯田员外郎田敏充详勘官；兼委国子监于诸色选人中，召能书人端楷写出，旋付匠人雕刻，每日五纸。”这都证明监本雕刊时的严格认真。

在赵宋初期，已经准许民间雕刻经书，但仍须依照旧例，用监本作底本，不许任意篡改。世称北宋所刻经笈最善，原因即在于此。

宋代刻印的释竺道生

北宋建国以后，刻书范围继续扩大。佛教徒对于刊刻经卷极为热心，当时政府对刊刻佛经也很注意。宋太祖赵匡胤开宝四年（公元九七一年），命高品、张从攸，在四川益州（今成都），监雕大竺经五千余卷，这是中国出版史上第一次规模宏大的出版工作，世称《宋开宝刊蜀本大竺经》，简称《开宝竺》。又称《蜀竺》。全书五千零四十八卷，卷子装璜，共四百八十函。自开宝四年开雕，至太宗赵光义太平兴国八年竣工，计雕版十三万块，工程之大可称空前。可惜现已无全本传世。北京图书馆仅存有残卷。此外，一九二四年八月，杭州西湖雷峰塔毁坏，还发现了开宝八年（公元九七五年，即吴越王钱俶在位之二十九年），吴越国王钱俶倡刻的《陀罗尼经》。文多

剥落残缺，仅有少数完卷可诵。亦呈于北京图书馆。

神宗时，福州刻印了一口大正经，从元丰三年（公元一〇八〇年）开始付雕。因为是由东禅寺觉院住持冲真等发起募款刻印的，故世称《福州东禅寺大正》，简称《福正》。全正共四百七十九函，至徽宗崇宁二年（公元一一〇三年）刻完，故又称《崇宁正》。今世所依东禅寺本《华严经》卷八十题有：

“福州东禅寺觉院住持慧空大师冲真于元丰三年庚申岁谨募众缘，开大正经版一副，上祝今上皇帝圣寿无穷，国泰民安，法轮常转”。因又称崇宁万寿大正。版式是梵夹式——即折装，后来折装形式即开始于此。以后又刻了《契丹正》、《昆卢正》、《思溪正》、《磧砂正》，皆为宋刊。《福州正》、《昆卢正》散卷残本还常见到。

宋朝太宗时候，人们崇仪迎教，太宗为了实行拢络，也就假意仪印，并广求迎书，甚至把先秦诸子百家都收拾在内，得七十余卷，命徐铉、王禹偁校正，删去重复，得三千七百三十七卷，缮就进太清宫。真宗赵恒大中祥符初年，又把秘阁迎书和太清宫所正迎书，全数运往余杭，命学士戚纶、漕运使陈尧佐，迎士朱益谦、冯德等，书事参校，命王钦若总管其事，分目为三洞、四辅、十二类，共四千三百五十九卷，目录上献，赐名《宝文统录》。徽宗赵佶在崇宁中又诏访迎家遗书，就书艺局令迎士刘元迎（字景初，开封人），核定大正，又增至五千三百八十七卷，于政和六、七年间送福州国县万寿观，令福州杭州黄裳拓工钱版，进于京师，因名《万寿迎正》。

靖康变起，高宗赵构南渡，遣尚书宋时经版，为金人掠去，金命孙迎明补刻，是为《金迎正》。至世宗乃耳真后桡刻三年（宋高宗四年），宋德方弟子秦志安在京都观应镇板刊迎正，世称《京都宝正》，又名《宋德方正》。到了元世祖忽必烈时，

因为他兼信佛教，就下令将一切边数经典和经版全部销毁。因而元朝以前所刻边书几乎灭迹。传世幸存的，据所知仅有北京市中国书店从废纸中抢救出来的元代刻印《太清凤露经》一卷，和北京图书馆所藏《云笈七签》的残页了。

四部大书的纂修及其版本

宋太祖死后，太宗赵匡义继承乃兄天下，惟恐太祖一代的旧臣或有不安，同时还防范五代的一些佞幸旧臣，就想出一个怀柔拔路的办法来安置这些人。于是从太平兴国二年（公元九七七年）起，命令李昉等开馆先后纂修了三部大书——《太平御览》、《太平广记》、《文苑英华》。真宗赵恒，见他父亲太宗时编写了这样三部大书，自己也想编纂一部大书和父亲媲美，于是就在景德二年（公元一〇〇五年）九月二十二日，敕令王钦若、杨亿、钱惟訢、杜鎬、刁衍、李维、戚伦、王希逸、陈彭年、姜奥、宋昭序、陈越等纂修一部大书，总结前代事实，作为将来典故，使开卷者，动有资益。于是就又编纂了一部一百卷的大书——《册府元龟》。这就是宋朝纂修的三部著名大书。

《太平御览》，初名《太平总类》，后改《太平御览》。《春明退朝录》记载说：书成之后，呈进参文殿，太宗自览三卷，一阅读完，故赐名《太平御览》。共一百卷，采书一千六百九十种，书分五十五门，征引浩繁，所载古贤佚文，虽亦采自类书，然资以考订，最考古者很多，是一部研究学术很有用的参考书。《御览》纂成后，付梓雕印，无文可考。根据著录记载和流传所见，有如下几种版本：

一、北宋本：北宋明时已不全，到清嘉庆年间流传在人间，仅三百六十六卷。每半页十三行，行二十二字或二十三字。明

时初属中山王邸，故书上有“南川高士”、“东海豪家”二印。后归内府，故又有“文渊阁印”，也就是《文渊阁书目》所载不全之本。明中叶以后，文渊阁书渐次散失，至洪初，归崑山徐氏侯是楼所上，后又归奚县朱文沈家，惠林曹馆于朱家，因得借阅，故又有“惠定宇借观印”。嗣又佚至同县周锡瓚家。嘉庆甲子（九年），同郡黄丕烈以二百四十金从周家购得，近为士礼居珍贵古笈之一。克翁卒后，书又同郡汪士钟所得，后又佚至湖州徐氏。同治间，归安陆心沅嗜宋成癖，以白银百两婉转购得，置之皕宋楼。但至此又佚去十五卷，仅存三百五十一卷了。书中遇胤、悛、殷、恒、贞等字皆缺笔，而恒字不缺。据陆氏说：“是本刻印当在仁宗时，为此书刻本之祖。”“恒”字为钦宗庙讳，其刊印或在仁宗以后徽宗之前。光绪甲午（二十年，公元一八九四年）陆氏卒，光绪三十三年其子树藩以十万元之代价，将皕宋所上尽售于日人岩崎氏入静嘉堂文库了。

二、南宋国刻本。此本何年刊行反现在有否残佚传世，都不得而知，只见南宋蜀刻本卷首引《国朝会要》后附语说：“此集川蜀玩未刊行，东南惟追守所刊垂本，然其间舛误甚多，非特句读脱著，字画讹谬，而意义往往有不通贯者。”蒲叔献在卷首跋中（见《四库丛刊》本）也说：“《太平御览》……以载笈瓠多，无复善本，惟追守所刊，多磨灭舛误，漫不可考。”从上述记载，说明南宋国中已有刻本，但书中错误较多。

三、南宋蜀刻本。此本为宁宗庆元五年七月，薛季昶在成都府路转运判官兼提举学事时刻于治所，即周必大所说的蜀本。卷首有蒲叔献跋及双流李焘允跋，跋中近“御览”二字，都另起一行。蒲跋谈到刻书的经过说：“吾蜀文笈，巨细毕备，

~ 11 ~

而独缺此书。叔献叨遇圣恩，忝膺西蜀，因重加校正，勒工镂版，以与斯世君子共之。”李氏跋云：“《太平御览》一书，皆纂辑百氏要言……书成，始得流布世间，延阁竹帛已费网罗搜采矣，……锦屏南公被命再执兼提蜀学，简策之外，澹无他营，……募工镂木，以广斯文之传。廷允获与校仇，凡金根亥豕皆釐正之，字三万八千有奇……。”惟此本海内已无存者，海外日本尚正有残卷二帙，一主于宫内省图书寮，一主于京都东福寺。图书寮正本共页十三行，行二十二字至二十三、四字不等，版心有刻工姓卷册首尾有（“金泽文库”印记。主于东福寺者，仅见之于森立之的《经笈访古志》。张元济在“四库丛刊”本《太平御览》的跋中说，此本即是蜀刻。

四、明倪炳校刻本。此本传世较多。书前有万历改元（公元一五七三年）春月上浣黄正色序，所以俗称黄正色本。

五、明活字本。卷首附有蒲叔献、李廷允二跋，又有姜塾周堂识语，末有“国中饶世仁、沈廷桂正撰，锡山赵秉义、刘冠印行”二行，版心下间有小字“宋版校正国饶氏同版活字印行一百余叶”二行，也有约勿饶氏二字为沈氏。卷第一李氏等奉敕纂大题占四行，“敕纂”二字提行别为一行，第五行称：“皇明顺天解元海虞周光富重校”，半页十一行，行二十二字，版心既有“宋版校正”等字，又附有蒲李二跋，可能是根据南宋蜀刻本所刻。此本流佚较少，有时还能见到。

六、清汪昂序活字本。《书林清话》卷八载：“嘉庆丙寅（十一年，公元一八〇六年）扬州汪昂序用活字校印《太平御览》一千卷，每卷后同题本、吴兴陈杰、沈晨、似恒、斗黄生分校等字，卷前存黄正色序，似是出于明刻本。颇为罕见。

七、张海鹏刻本。黄庭坚为海鹏作《行状》，叙刻《太平御览》之经过说：“海鹏又念六朝古笈罕存，惟《太平御览》

中征引颇多，是一书传，而群书之匡略以传，允称类书之冠。宋人观复堂主有明人旧钞，据为主本，校仇再三，付梓未半。复从何上舍得彤宋钞本，详加复勘，已刊者不悞刻改，中有两册为两本俱阙，复从上海至宁波范氏天一阁补钞，是书始臻完善。”张刻行世不久，版即遭毁，迄今佚本，已稀如凤毛麟角。

八、清鲍家城刻本。卷首有阮元序，鲍氏自序。自序中说：“嘉庆丙寅从宾保阮芸台先生借得此本，盖用宋槧并彤宋钞合校临本，文句叙次悉与通行者不相同，积两年日月校刊始毕”。鲍氏付梓，虽依阮文达所正者为主，而阮氏校勘并不精详，其中讹误脱字较多。叶郎园说：鲍刻远不如明活字本，亦不如张刻本，而世间所以盛行者，以有阮文达序而为推重。

九、日本仿宋聚珍本。日本孝明天皇安政二年乙卯（清文宗咸丰五年）喜多村直宽据渡人所刊宋版（即鲍刻本），略为整正，用聚珍版印行，至文久元年辛酉（清咸丰十一年）竣工。

十、《四库丛刊三编本》。公元一九二八年（民国十七年）张元济到日本访书，先到静嘉堂文库看到陆氏所正《御览》，后在帝室图书馆、京都东福寺看到宋蜀刻本。张元济借以影印，所缺之二十六卷，则用喜多村直宽之聚珍本既补。卷后附有张氏跋。一九三五年冬，商务印书馆出版，分订为一百三十六册。

此外，尚有清光绪十八年（公元一八九二年）广东重刻鲍氏本。曾加工校勘，改了不少字，与鲍本不完全相同。光绪二十年（公元一八九四年）上海格致书局石印本，一九六〇年二月，中华书局又以原商务《四库丛刊》本，影印出版，分订四册。

《太平广记》与《御览》同为李昉等奉敕纂修而成，共五

百卷，目录十卷，分为五十五部，其实是分了九十二大类，所采书头五百种。古来奇文秘笈大都搜括在内，至多谈神怪，但也记载了不少名物典故。此书在太平兴国二年（公元九七七年）三月奉诏集次年八月书成奏进，八月奉敕送史馆，六年正月奉旨雕版。后由于书中内容非后学急需，将版赠于大德林，所以宋人反而多数没有见到此书。因此，宋元两代流传极少。到明朝中叶，无锡谈愷得其钞本，据以刊行流传。兹就所知，略举其版刻如下：

一、宋刻本。宋刻极罕见，仅以吴克床所立许自昌刻本，提到经陈仲实依牙本手板一过，惟仲实板后，未著一语，只有吴氏于嘉庆癸酉（十八年）跋称：“可为括策之良本矣”，亦未详言宋本出自谁氏，其行款若何？今陈氏依据之宋本固不可见，即板过之许刻，于民国三年曾流出于上海利川书屋，为王培孙所收，民国七年傅增相富借阅一过，今亦不知落于何处。

二、明嘉靖谈刻本。嘉靖丙寅（四十五年，公元一五六六年）无锡谈愷十山得《广记》钞本，他说：因佚写已久，亥豕鲁鱼，甚至不能以句。因与二、三知己秦汝山、强靖脰、唐石东互相校仇，寒暑再更，字义稍定。”所以胡应麟说：“于此书颇肆力校仇，且补苴罅漏，使之行世，为功不少矣。”《广记》在佚本中，谈本堪称佳刻。

三、明嘉靖常州府刻本。此本罕传，未知所据何本付梓，仅见于观古堂叶氏仿明刻本，同弘祖《古今书刻》中列入此本。

四、明隆庆活字本。此本字迹模糊，为《广记》版本之劣者。

五、明许自昌刻本。许刻所用底本就是谈刻，所以仍印有谈跋。许刻本在校仇方面，似乎较谈刻更多而且更精。于当中卷，题有“明长沙许自昌玄佑甫校”字样。每半页十二行，

行二十四字。《广记》在传本中，谈许二刻，均不失为佳槧。

六、凌黄刻巾箱本。乾隆二十年（公元一七五五年），天都黄晟晚峰板刊小字本，槐荫草堂主版。卷首有黄氏乾隆十八年序文，略称：“兹以卷帙浩织，不便于囊帙行笈，因为依仇执刻而易以袖珍窄本。”

七、凌坊刻巾箱本。嘉庆十一年（公元一八〇六年），苏州聚文堂坊刻巾箱本，此即据黄晟刻本执雕，故与黄本形貌相同，本子大小也相似，惟字迹不明，错误也多，不能与黄本同时并论。

八、《笔记小说大观》本。民国十一年上海文明书局印本。《广记》收在《笔记小说大观》第六集内。是根据黄刻本而印。

九、扫叶山房本。民国十二年印，据其主人序说：“近得乾隆间袖珍初印本，因重缮校印行”。惟其中多杂入明清人著述，且不注明出处，身展栏楹，序说所托乾隆袖珍初印本，实参自欺欺人之语。

十、文友堂影谈本。民国二十三年，北京文友堂书店影印谈刻本。版框缩小，较巾箱本略大。《广记》版本中较坏而可得者，当许此本。

解放后，人民文学出版社以谈刻本作底本，用明吴县沈氏野竹斋钞本，凌陈铨校本校勘，同时参向了许刻本，黄刻本排印出版。

《文苑英华》，一千卷。太平兴国七年（公元九八二年）李昉、扈载、徐鉉、宋白等奉敕编纂而成，后又命孙承甫、三对等考定。实则为“御明文选”与续编。《文选》迄于梁初，《文苑英华》则迄于宋末，而下至于元。然南北朝之文，所收不过十分之一，而唐代之文则收进十分之九还强，几乎是在中收入。以文体分为赋诗并三十七类，共收诗文一万九千一百零

二首。唐人诸集，佳世自秘，幸能秘此篇以存。其分类编辑，体例与《文选》大体相同。

《文苑英华》之雕版行世，在太宗朝纂的三才大书中是最晚的一种。《太平广记》在太宗朝即以开雕，《太平御览》到仁宗朝也已行世，独《文苑英华》直至南宋宁宗时才雕版印行。兹将所知各朝刻本分列于后：

一、南宋嘉泰年间周必大刻本。半页十三行，行二十二字，二十三字不等。线黑口尚有白口，单鱼尾或双鱼尾不一，左右双栏。于嘉泰元年周必大告老还乡家居时，选派临江军巡抚王思恭督工刻印，至嘉泰四年（公元一二〇四年）秋告成。由门客胡柯、彭叔夏根据众书详加校正，因之，又成《文苑英华辩证》十卷。此本宋讳缺笔至“邸”与。北京图书馆上有此本。在每册封页什页左下方有“景定元年（公元一二六〇年）十月或十一月日，装背臣王润监管说”本记一行。宋版书记装背人姓名者尚不多见，并由此说明此书印成之后，经过五十七年又另行加以装璜。

二、明隆庆年间刻本。嘉靖四十五年（公元一五六六年）余姚胡维新奉命按闽，购《文苑》旧钞本，檄文福州太守胡弼，泉州太守万庆雕版，督抚涂泽民，将军戚继光都予大力协助，于隆庆元年（公元一五六七年）刻成。卷首有涂泽民序，胡维新自序，自序中叙述刊刻之缘起及经过。半页十一行，行二十二字。

三、明会通馆活字印本。

四、明天府刻本。

以上两本，极为罕见，只见记载，不曾见过佚本。

五、清坊间刻本。此本卷首已无涂泽民、胡维新序，刊刻年月不详，拟在清初康熙雍正间，行款写刻部与隆庆间本相同。

乍见之，几不辨为两刻，版心下刊刻工姓名“蔡昌”亦同，当系据隆庆本刻。

《册府元龟》从景德二年九月开始参撰，至大中祥符六年（公元一〇一三年）八月编成，共用了八个年头的时问。全书编好进呈后，真宗亲为制序，赐名《册府元龟》。“册府”是书笈总汇的总称，喻为书册的府库。“元龟”就是大龟。我国古人用龟来占卜吉凶，“元龟”在这儿是表示垂鉴借鉴的总称。起《册府元龟》这个书名的总称，就是说这是一部古笈的大龟，可以作为君臣的鉴戒，也就是“前事不忘，后事之师”的总称。

参书开始时，先令钱惟济等人各拟就篇目，送王钦若和杨亿审阅，王杨看后，大概是不甚满意，自己又撰写了一个篇目，一同呈进。真宗选定了王钦若、杨亿所撰的篇目，篇目确定，就动手收集、编排材料。既是由编参官分头动手的，后来真宗认为大家分写前后体例不一，乃指定李维等六人撰写，交由杨亿统一文字，经杨亿参改后定稿。

《册府元龟》初拟名为“《历代君臣事迹》”，所以编撰人叫做“编参君臣事迹”官。对编参官的起居饮食，有特殊供应，由有人管理，持派内臣（太监）刘永规、刘崇超掌管其事。并时有赏赐，个别编参官还有升级或增加月俸，以资鼓励。

杨亿，字大年，宋时南城人，博览强记，很有才华，长于写作，太宗闻其名，诏至阙下试诗赋，授秘书省正字，后赐进士第。真宗时为翰林学士兼史馆参撰，为人耿介，尚名节，尤喜海内名士。

王钦若，字定国，新喻（原江西省）人，早孤，太宗伐太原时，钦若年才十八，作《平晋赋论》献给太宗。寻擢进士甲科，为亳州防御推官，累官至司空门下侍郎，同平章事，翰林学士。钦若状貌纤小，项有附疣，人称为疣相。然而机智过人，